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一期／民國 93 年 9 月／頁 49～74

我們活在不同的台北？
─台北政治暨文化性格：1994-2002

莊雅涵、王奕婷、吳偉立*

摘　要

本文起於政治心理學的擬旨，並結合部分文化研究的成果，分析「台北市」作爲一政治主體的政治與文化意向／象。市長民選的機緣肇發了構築以「台北市」爲認同主體的需要；陳水扁與馬英九各自以市政政策召喚其對於台北城市、市民的主體想像。然則二人不同的施政作爲不但反映了台北主體建構於前後時期的不同需要，看似中性的政策卻透顯二人由於其「省籍」差異而實則立基於不同的歷史想像上，在各自的台北主體論述中需要不同的撫慰、撿拾；而不同身分的市民自也有其殊異的認同需要，在二任市長的政策中或受毀傷或得療癒，然則集體性的「市民認同」並非市民生活實踐的全部，在全球資本主義脈絡中市民個體化的消費行爲實則有著溝通的動能，也爲城市主體營造帶來新的契機與危機。

關鍵詞：政治心理、省籍、認同、主體性、文化研究

*本文三位作者皆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收稿日期：92 年 7 月 15 日；通過日期：93 年 5 月 10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要小心，不要對他們說，
有時候不同的城市在同一個地點，依序承繼同一個名字，
在不知道彼此的狀況下誕生與死亡，相互之間沒有溝通。
有時候，甚至居民的名字還都一樣，他們的口音與容貌的特質也都相同；
但是，活在名字之下、土地之上的諸神，已經不發一言地離開了，
外來者則在他們原先的地方安頓下來。
詢問新城比舊城好或差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們之間沒有關係，
就好像舊明信片描繪的不是模里利亞的過去，而是一個不同的城市，
只不過湊巧像這個城市一樣，也叫做模里利亞。
—（Calvino, 1993: 44）

壹、城市身世與主體政治的開展

從殖民時代迄今，台北之於美麗之島台灣的「首善之都」地位始終無庸置疑。在台灣後殖民認同政治的論述建構中，台北時而作爲台灣此一想像社群的朝聖中心，時而又在南北對立的氛圍中被視爲一客化的異己；而作爲在台北居住或求學的「台北人」，[1] 切身感受到城市內部階級與空間的多重矛盾和自我形象的曖昧，更構成了我們剖析台北市城市性格的動機。

由歷史特性觀之，台北基本上是個移民城市，容納了一九四九年來台的外省第一代和六、七〇年代經濟起飛期的中南部移民；加上前此的殖民首都背景，台北的城市主體性可謂高度空白、憑任移民填補書寫。[2] 另一方面，就都市本身的政治態勢觀之，首都地位和長期的市長官派使都市決策常被中央操控，市民意志及結社能量被集權政府壓抑，移民狀態更強化了原生認同和同鄉互助網絡，致使強調公共性的市民認同形構更加緩慢薄

1　此處加上引號，一來乃因作者們並非原生的台北（市）人，另一方面也標誌著對「台北人」作為一個範疇的內涵之存疑。

2　當然在全球化的今天，台北街頭也多了外勞、外籍新娘和歐美裔住民的身影，然由於本文的焦點為台北的公民文化和政治認同，因此所提及的移民將僅指涉前文所提到的兩種背景者。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弱[3]－精確地說，台北的都市化過程中是看不見市民身影的（the urbanization without citizens），民間的自主性和自律性都處於低度開發，既沒有經歷過多元的歷史思維，也缺乏共同肯認的核心價值。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九九四年的台北市長選舉因而意義非凡－習慣於長年來的威權支配，如今第一次面臨以都市爲單位的選舉和政策論述，因而迫使缺乏市民社會主體的台北市民從頭思考城市自身的認同依附；但長年來黨國體制的支配已模糊化「台北市」作爲一政治主體的疆界（boundaries），加上城市內部錯綜的族群／階級差異和主體性的空白，台北被迫在歷史刻痕與全球化語境的多維交錯間往復追索都市的主體內涵，尋求市民集體共享的價值與目標，開展城市認同政治。

自我認同肇發於對於自我存在的認知，即試圖建立主體性、與客體進行人我區隔的過程。認同的需要來自於對死亡本能的限制，依此而超越人初生時渾沌朦朧的狀態，倘若認同的架構受到毀傷，則會將人推回類似的渾沌狀態而嚐受焦慮與莫名恐懼（石之瑜，1999：182）；認同的形構包含對主客體間疆界（boundary）的區劃，而其鞏固更來自持續不斷地人我區隔。然則主體疆界如何界劃，牽涉的卻是權力運作的過程，亦即擁有特定資源者方能掌握界定客體的權力，透過排斥或征服來鞏固主體界線（石之瑜，1999：177）。在此過程中，「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塑造或重述往往即用以界定集體疆界、凝聚集體認同（王明珂，1994）。

1994 年台北市長選舉，長期的空白模糊後對於城市主體的迫切尋找使城市一時進入了失去主體邊界的錯覺世界（psychotic time）；爾後的都市歷史則接續進行著各式說出城市主體的努力，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市長既來自迥然的背景，其召喚出用以凝聚城市認同的集體記憶也各不相同，其中所洩露的主體想像實耐人尋味；而在官方孜孜矻矻形鑄的論述之下，市民們又是怎樣來參與和回應城市文化的主體書寫呢？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們首先將檢視兩位市長任內的政策方向和市政論述，接著閱讀朱天心轟動一時的作品《古都》中反映的族群政治情感結構，最後把焦點移至城市的文化展演，以觀察消費文化對於市民政治的滲透與互爲表裡之可能。透過

[3] 《台北人》中藉飄零的外省移民而訴說的，何嘗不是這樣一種鄉愁（白先勇，19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樣由上而下、由政治而文化的閱讀順序，冀能描繪出城市政治心理的一部份輪廓。

貳、「誰的」快樂與希望？－扁馬施政對照記

一、陳水扁時代（1994-1998）

一九九四年的台北市長選舉，在三強鼎立的形勢中，黃大洲打出「首都保衛戰」旗幟，新黨提名的趙少康操縱族群認同符碼喊出「中華民國保衛戰」，相較之下，陳水扁卻緊守市政格局，以「市民主義」精神打造適於安居的「台北新故鄉」－

「牽台北的手、走希望的路－
像一個小孩，要開始學走路，
台北，終於要踏出他的第一步——
這一步，讓我們可以選擇希望的明天！
這一步，讓我們可以決定更好的未來！」

—（陳水扁競選文宣〈牽台北的手、走希望的路〉；轉引自楊文全，1999：86）。

「從來沒有一次，我們這麼清楚地以『市民』作號召，號召每一個人珍惜自己當家作主、自行決定我們城市命運的機會。在過去，市民的主體性和重要性，總是被刻意忽視，『小市民』一詞正代表著無力、無奈，多麼地微不足道。

在這一次，我們要清楚、勇敢地提出，市民才是這個城市的真正主人；官員、財團不是我們的老闆、也不是太上皇，他們無權高高在上，主宰我們城市的未來。『市民』，平平凡凡的市民，只要透過集體的力量，就可以改變這個城市，重新建立我們想要的家園。不用移民，不要出走，拾起市民的意識，向傳統觀念挑戰，和特權階級對決；我們不畏懼，我們可以大聲喊：市民的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代來臨了。」

－（陳水扁語；轉引自楊文全，1999：25）

陳水扁的勝選，被解讀爲「市民主義」爭取游離票的成功。對許多厭倦意識型態惡鬥的選民而言，陳水扁洋洋灑灑的市政白皮書和一百多位「市政顧問」的背書，似乎更爲可欲。然而陳水扁畢竟是從夾縫中驚險勝出，如何減少民意阻力並爲連任鋪路？上任後的認同形構工程於是包含了兩個層次：一方面要瓦解－或至少遮掩－選戰中被挑起的族群對立，盡量減低因爲國家認同歧異而產生的傷痕，同時淡化前此中華國族意識形態在台北地景中留下的諸多象徵；另一方面更需另外塑造一種以城市爲單位、不分芋仔蕃薯都能歸屬其下的市民認同。此二面向的工程如何相輔相成？

爲了消解台北市特殊族群結構所隱含的緊張，陳水扁上任後刻意淡化各族群間歧異的國族認同：一九九五年十月舉辦「落地生根、終戰五十年」活動，提出「落花生」意象，比喻不分族群都在台灣落地生根；一九九六年二月將台北新公園更名爲「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同時將總統府前的介壽路更名爲「凱達格蘭大道」；乃至同年內市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的成立，都表彰著清洗傷痕、族群和諧共治的期待。含糊響亮的「市民主義」口號也彰顯其不分族群，「只要認同台北，都是新好市民！」

然而消弭各族群的認同差異並無法如數轉移爲城市認同。喊出「快樂、希望」的陳水扁，上任後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就是「他是個很愛辦舞會的市長！」，在化妝師的巧手妝點下，市長動輒以各種炫目造型出現於舞會活動，一場場熱烈的嘉年華無不提醒著大人小孩這是個多麼值得安居的城市，『市民大道』命名與空間安排，更是強化市民認同的具體表現。開放士林官邸、市長官邸、開放馬路舉行飆舞活動等空間解嚴的作爲實則也扣合而填充著市民主義的內容。但歡騰的市民主義氣息並非不勞而獲，無論陳水扁如何信誓旦旦聲稱作一位「全民市長」，必然得回答「誰」才是值得攏絡和認可的「市民」主體，亦即都市中各類階級、團體利益與影響力的不一致勢爲其所須取捨；加以城市主體性尚待形構，而有效辨別彼此、澄清人我分際的便宜方式，便是從內部尋找、主動定義出不屬於市民所認可的成份，再透過該部分的犧牲與獻祭，以完成市長口中遙遠而美好的願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景。

在陳水扁致力打造「台北新故鄉」的四年任期中，我們看見了這些以「美化城市」爲名的抗爭與犧牲：

杕十四十五號公園事件及「反對市府推土機運動」。

杌掃除八大行業。

杈廢公娼。

杷拆除雞南山、寶藏巖等違建聚落。

杼其餘違建拆除（包含政治違建和計劃用地違建）、取締攤販、掃除路霸等。

認同架構的不明朗將使主體陷入渾沌失邊界的焦慮狀態，爲欲突顯主體的清晰存在往往需不斷地切割出「我」與「他」，甚至是在群體內部清洗出「他者」而鞏固主體「我」的認同。陳水扁藉由鎮壓、驅逐長期處於社會底層且遭污名化的群體，挖除清理「都市之瘤」，才打造了市長口中的「台北『新』故鄉」：透過把「都市之瘤」的利益與「台北市民」的利益對立的論述，以證成取締違建與非正式經濟的理由；表面上具國際前瞻視野與進步生活品質的全新市民想像，其中所強調的「公共利益」其實只是溫馴禁欲的中產階級價值。而此中「市民主義」所訴求的「市民」實則充滿排他性：在挑選犧牲對象時機敏地以大多數市民所排斥的社群作爲其獻祭的牲禮，由於被犧牲的群體在遭陳水扁犧牲之前，往往已被「台北市民」視爲過街老鼠，陳水扁的適時插手既服膺台北市民對該社群的主觀排斥、同時亦達到祭師(即陳水扁自身)的政治目的—淡化、擱置各族群間原有的史觀落差，將台北的主體內容放入括弧等待重構。

二、馬英九時代（1998-2002）

陳水扁在其主掌台北市府的四年之間，有效地運用進步、與國際接軌等字眼，爲「以台北市爲主體」的認同想像填充內容。在陳水扁強勢主導填充下，台北市的主體面目已不再空白模糊，馬英九上任後一方面承繼此一主體定調，另一方面面對陳水扁政策中隱含的特定台北歷史觀，卻也使用了不同的政策以代換之。馬英九競選中的主要重點，雖放在陳水扁任內的抗爭事件及「鴨霸扁」等相關概念，但其上任後仍舊服從於陳水扁所訂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立的基本政策取向。

一方面爲服膺於已被市民接受的台北市主體想像，馬英九治下的台北市仍可看到關於市政進步、國際化的宣說；另一方面由於馬英九仍需不斷維繫市民認同，清洗區隔的需要仍在，然而由於主體失邊界的焦慮已大爲降低，種種犧牲獻祭以證成主體存在的動作顯得緩和，例如掃黃廢娼等政策方向仍持續但其手段較之陳水扁即明顯柔軟。

然馬英九如何在此基本格局中代換掉陳水扁政策中隱含的欲消弭一切而視之以空白的歷史觀呢？馬英九唯一能夠讓民眾接受其新型態的市政作爲，同時重新暗地中找回其特定的關懷，就只能在陳水扁的市政格局之外另外開闢新的疆土，而官方定義歷史的最好工具：文化政策，即是呼喚回憶的最好方法。我們認爲，馬英九的文化政策，不僅是馬英九市政作爲中較有意義的部份，同時更是其自身刻意被他人認識、並與陳水扁相互區隔的部分。[4]

龍應台在卸下文化局長的身分後，對外說明其文化政策理念：「都市的改造不只是拆房子建房子；拆什麼建什麼的每一個決定其實都是文化的抉擇，透露出我們對過去的認識以及對未來的想像。老屋代表著生活方式、處世態度，甚至生命哲學。拆老屋建新屋，就是以不同的空間格局塑造另外一種生活方式、處世態度、生命哲學。它不僅只是土木工程，它是文化的開啟與創造，是我們傳承給下一代的生命哲學」（2003）。那麼馬英九與龍應台兩位「外省人」打造的文化政策中蘊含怎樣的集體認同思維呢？

綜觀龍應台的文化施政，大致可梳理出三項主軸[5]－

朴標榜台北的「（國際）華文首都」形象：發起「亞太文化之都」提倡城市文化外交、開闢國際藝術村定期邀請駐市作家與藝術家、舉辦華人國際詩歌節、乃至在國內發起「縣市文化合作結盟機制」，

---

4 從馬英九刻意禮聘龍應台回台任首任文化局長並主導文化政策，即可說明馬英九對文化政策的重視；台北市府在諸多場域中，亦有意無意地突顯龍應台做為一文化人，對市府團隊產生的良性影響，更可說明馬英九確實有意將文化政策作為其市府政策的樣板、將龍應台作為代表台北市府的暗諭。

5 整理自台北市文化局（20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隱然在政治格局之外另立一文化行政的首都龍頭角色；又策劃以城市爲主題的文學獎、電影節、出版節、公車詩文比賽等，形塑多元混血（hybrid）的「台北學」。[6]

杌古蹟與傳統文化的再生：研究顯示從一九八三年文化資產保存法執行至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台北市內共指定了 99 處古蹟，而其中自一九九八年後所指定者高達 62 處（廖世璋、錢學陶，2002），可見文化局在古蹟保存推動工作中角色之積極。而古蹟不只加以修繕開放參觀，也往往尋求與商家結合以「活化古蹟」，如西門町紅樓改建劇場、市長官邸改爲餐廳和藝文空間、美國大使館重建爲光點台北電影院等。甚至連險遭陳水扁拆除的寶藏巖社區，也在龍應台手中改頭換面辦起了電影節。另外也舉辦了多次以地方戲曲等庶民傳統爲主題的藝文賞演活動，[7] 強調傳統現代兼容的人文圖像。

杈厚植民間創新與經營的能量：舉辦「文化就在巷子裡」等社區活動協助藝術紮根，以公有民營模式和文化產業基礎調查加強與民間的互動。

從這幾條軸線構織出的龍應台的文化觀，其包含了兩重體認：首先理解到全球都市網絡中的台北適可以文化作爲和世界交往的橋樑，對此廣漠的世界則依文化的親近性劃分爲華文世界和非華文世界兩個同心圓；在此全球化態勢中卻又隱然湧動著一股在地化的張力，需藉再生集體記憶充作在地認同的素材。她所主導的文化論述，正是在地方歷史記憶與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孕育向世界發聲的能量。

記憶具有選擇性。而官方所保存的城市歷史未必能符應市民對都市之認同依附。[8] 但問題在於什麼樣的記憶能夠被官方提出來作爲城市象徵？

---

6 曖昧的是這些藝文活動不僅訴求著在地市民的參與，也不忘對外縣市的民眾招手，是故第三屆台北文學獎 22 位得獎者中，有八成為外縣市人士（聯合報，2002），顯然「台北學」的蔚然成形不單來自市民的響應，更當仁不讓地吸納了島內民眾對首都的朝聖嚮往。

7 包括「歌謠、百年、台灣」，「藝術、廟會、當代」，「老地方、新發現」，「傳統音樂季」等活動，貫穿其中的思維是新舊文化在本質上的延續性。

8 廖世璋等（2002）便藉分析台北市各古蹟指定過程中的糾紛抗爭和後續修繕保存的困難，批評文化局指定古蹟保存的模式其實是以公部門專業思維所主導、欠缺社區意識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誰的記憶值得被保存珍藏？官方每完成一個紀念的動作，同時也是對另外某一些文化與記憶的遺棄，因此馬英九所撿拾的歷史片斷毋寧是觀察其如何認定城市身世的參考點，那麼他們想要喚回的又是什麼？

三、誰的市政、誰的記憶？

觀察扁馬兩人形構市民的策略，前者乃一面以各種嘉年華式激情與去威權的象徵操作消解北市族群結構的內在緊張性，同時不惜藉由犧牲底層人民換取更精緻生活品質以迎合中產階級之城市生活品味；馬英九則是在陳水扁所整頓的基礎上「繼續」打造布爾喬亞之城，同時又以活躍的文化政策營造一系列關於城市主體的共同想像。然而此施政取向乃是附著在什麼樣的主體想像之上呢？

對於在台南鄉下長成的「阿扁」而言，台北雖然是其成家立業之處，對他個人的土地認同意義卻是有限的。[9] 身爲來台北「討生活」的中南部移民的一員，台北是個充滿可能的新遷徙地，加以成長經驗見證了台灣經濟的起飛，繁榮與進步的價值是此戰後嬰兒潮世代共享的信仰，在在使其可堂而皇之喊出「台北新故鄉」願景，城市的歷史和在此生活的記憶對於像他這樣的移民而言並非具有構成性意義的家產（properties）。出於威權體制下成長並親身參與反對運動的經歷，台北作爲威權時代政治中心的歷史象徵是他急欲拋掉的負債；而如何在這樣瀰漫著威權歷史象徵的城市氛圍中揚升屬於其本省族群的資產更也成爲其另一層面的關懷。在這種認知下，陳水扁處理台北市歷史的方式便是一面將負面資產－威權象徵與破敗聚落－傾力剷除，一面樂觀地向前看、打造安居樂業的台北城，其中也不忘以精緻藝文消費的方式爲曾受壓抑的本土（包含閩南、客家）文化創造出其現身「首都」公共場域的正當性，此種扣連實則撫慰了本省族群自覺於威權體制下被貶抑的創痛。對於陳水扁而言，除了這些屬於威權與悲情的不悅回憶，城市的內容彷彿可任意填充的白板，台北「新」故鄉召喚著空白而全然向前的城市認同主體。相對於陳水扁，馬英九這樣在台北度過

合的介入，以致於對地方居民而言古蹟常常是標籤而非記憶、對建物所有人而言是負債而非資產。

9 這由陳水扁當選總統後，對自己「台南囝仔」身份的強調，表現得尤為明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半生的外省人士，其背負的家產（bearings）就沉重許多。

移出的成功性建立在某種沒有完全移出的假象上，故須在移入地創造呼應故鄉的象徵以撫慰自我身分的游離，而國民黨遷台時留下的這些痕跡對外省人因而異常親切（石之瑜，2001）。從政治意識而言，台北市從國民政府定都來就隱含了反攻大中國的統治意識－道路的命名與神州地理的對應正反映此心態－故外省移民常有「踏出台北皆異鄉」之感；而除了在地居住經驗的附著，外省菁英在黨國政經結構中又是受到特殊眷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對舊時代的懷想就少了本省人慣常的悲憤，城市中點點滴滴的地景、傳奇從而都承載著個人特殊的認同歸屬。當本省人出於政治情結而對某些空間懷有不友善的威權敏感時，外省人對各城市地誌少了一份不悅，卻多了一份「它一直都在那兒」的熟稔，這個滿載歷史的前殖民城台北遂成爲婆娑鄉愁和此際生命的交會處。此種家產認知，既是老兵在陳水扁拆除康樂社區時選擇自殺的推力，也是馬英九和龍應台在國際化壓力下念茲在茲不忘歷史縱深的認同所繫。

每一政策宣示皆隱含著想像的追尋。陳水扁對於違建住民和非正式行業的「鴨霸」掃蕩固然殘忍，馬英九的文化政策何嘗沒有假「文化」之名將其家產丟入城市集體記憶框架遂行換喻（metonymy）之嫌疑？更清楚地說，陳水扁所設定的市民圖像（icon）是一侷限的中產階級市民，不論原本是否存在這樣一個同質性的市民範疇，隨著選戰結果和施政主軸的強化，此一階級在政治上的動員能量乃隨著市民自我認可的動作而實現。而馬英九在身段上雖柔軟，但大原則上仍接續陳水扁的市政格局，但爲求喚回遭陳水扁毀棄的歷史意像，而另起文化政策的爐灶，將隱含其自身需求的國族想像，隱含在高舉全球化、在地化的城市文化中，以表達主政者心中對國族的追尋、重新想像一個新的「台北新故鄉」。

但市民畢竟不是鐵板一塊，不會僅被動地聽任政治力命名劃群，則在官方的正式論述之外，讓我們嘗試追問：究竟誰需要被治療？誰在召喚著城市的主體？不同世代與群體的市民，是以何種方式闡連著（articulate）城市的主體意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古都》：鄉愁、記憶與死亡的碎片

「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朱天心，1997：151）朱天心的中篇小說《古都》呼應著龍應台「文化即記憶」的殷殷掛念。在這篇膾炙人口的小說中，作家藉著台北與京都的對比，悒悒惶惶地在城市中奔走追問過往的掛念今安在，卻只如誤闖桃花源的武陵人般頹然若失，「這是哪裡？你放聲大哭……」在作家焦灼的筆觸中，我們瞥見了記憶之於個人的紀念性，這些記憶並不單附著在張燈結綵的古蹟地誌上，也許僅僅是幾個似曾相識的街角、熟稔的古樸小店、茂盛的茄苳樹—

> 「你簡直無法告訴女兒你們曾經在這城市生活過的痕跡。你住過的村子、你的埋狗之地、你練舞的舞蹈社、充滿了無限記憶的那些一票兩片的郊區電影院們、你和她爸爸第一次約會的地方、你和好友常去的咖啡館、你學生時常出沒的書店、你們剛結婚時租賃的新家……，甚至才不久前，女兒念過的兩家幼稚園（園址頻頻易主，目前是『鵝之鄉小吃店』），都不存在了……
>
> 這一切，一定和進步有著勢不兩立的關係嗎？」（1997: 181-182）

> 「你記得一位與你身分相同的小說作者這樣寫過，『原來沒有親人死去的地方，是無法叫作故鄉的。』你並不像他如此苛求，你只謙畏的想問，一個不管以何為名（通常是繁榮進步偶或間以希望快樂）不打算保存人們生活痕跡的地方，不就等於一個陌生的城市？一個陌生的城市，何須特別叫人珍視、愛惜、維護、認同……？」（Ibid: 187）

> 「你們吃頓飯、喝個下午茶，聊遍眼前事，獨獨不再提過往，過往很像那些被移植或砍掉的茄苳與楓香。
>
> 因此你都不願意和別人回憶過往，並非因為新的事情太多，新的店、新的偶像、新的醜聞、新的賺錢機會、新的誰誰誰老公的情人、新朝新貴……，你猜想他們正因為能夠不記得曾經存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才能迅速與新的好壞事物相處無間吧。」（Ibid: 191）

作家一面表達自己的「戀舊」，一面也嚴厲批評城市在進步價值引導下的失憶與健忘。與諸多言必稱發展、勇於整頓城市以撫慰支持（holding）自己的政治人物相比，沒有政治權力的民間作者朱天心，不能拋棄的是在這城市中長成、初老的痕跡，因此當城市現代化的腳步愈是日新月異，家產被剝奪的哀傷也愈加不可承受。然而究竟爲何記憶對於個人的認同如此不可或缺呢？

> 「是這樣吧，在死之前，若還有一點點時間，一點點記憶，你還可以選擇去哪裡，就像很多人死之前急著離開醫院回到他熟悉之地通常是所謂的家，你，會選擇這裡〔京都〕吧。因為，因為唯有在你曾經留下點點滴滴生活痕跡的地方，所有與你有關的都在著，那不一定它們就會一直一直那樣在下去，那麼你的即將不在的意義，不就被稀釋掉了嗎？
>
> 你曾讀過某人記憶他在死牢裡的自傳，他說，看到窗外如常的陽光，聽到警衛在收音機傳出的熟悉小調，只要這些明天如常在著，他的死，就顯不出來了。
>
> 為什麼不是選擇你出生、成長、生育子女並初老的城市呢？
>
> 大概，那個城市所有你曾熟悉、有記憶的東西都先你而死了。」（Ibid: 195）

我們以爲，「記憶」的價值是來自其超越死亡的可能性。生之記憶的恆常性，恍若對抗死亡本能的鴉片煙。一個滿載歷史痕跡的場所，可使人們透過對「永恆」的確信而迴避對死亡的畏懼，只要與生命有關的事物仍鮮活如昔，則雖死猶生，趨死的焦慮因而被昇華爲向永恆貼近。但眼見台北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急速劇平過去，[10] 自稱「老靈魂」的作者彷彿目睹生命／記憶隨著推土機摧枯拉朽而凋零瘡痍－都市建設侵奪的不只是老

[10] 甚至是助馬英九當選的口號「新台灣人」，以呼告的口氣要本省人外省人忘記過往傷痕共同認同台灣，也只是再次把原先讓大家焦慮的認同創傷誤以為治療之道，而助長了身分錯亂的不確定感。見石之瑜，前揭文。

臺北市立大學圖書館 學術期刊資料庫

靈魂的家產，還包括其賴以建構自我認同的素材－萬般無奈的作家只好遁逃到妥善保存歷史的老城京都拼湊記憶的鏡像。行文至此我們不能不聯想到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曾區別的兩種時間感：奉經濟發展及國際化爲圭臬的台北就好比處在「質素統一、內容空白」的現代性時間（homogeneous empty time）之中，此種空洞的時間系統容不下主體有任何對抗、反省乃至架構差異之可能，容不下任何的延續或創新；但作家對城市的每個凝視卻都混融了深沉的感情，在時空錯置的追想依戀中提醒讀者當下生活經驗與歷史、文化的交纏，這般「面向過去、背對未來」的回眸姿態何嘗不是以班雅明式的「現在時間」（Jetztzeit）對抗都市現代化狂熱下不分青紅皂白的抽象（abstraction）。[11]

然而，城市對作家的殘忍還不止於此－

> 「二十年後，同一個日子同一個晚上，你和丈夫參加一個號稱十萬人的聚會……你本來只是想去捐些款，略盡能否把執政黨藉此拉下台的棉薄之力，像血書上的那一字那一勾，後來你們當然出不去了，你看到他與週遭幾萬張模糊但表情一致的群眾的臉，隨著聚光燈下的演說者一陣呼喊一陣鼓掌，陌生極了，終於有名助講員說了類似你這種省籍的人應該趕快離開這裡去中國之類的話，你丈夫忙亂中匆忙望你一眼，好像擔心你會被周圍的人認出並被驅離似的。」（Ibid: 167-168）

> 「你簡直不明白為什麼打從那時候起就不停止的老有遠意、老想遠行、遠走高飛，其實你不曾有超過一個月時間的離開這海島，……你從未試圖整理過這種感覺，你也不敢對任何人說，尤其在這動不動老有人要檢查你們愛不愛這裡、甚至要你們不喜歡這裡的就要走快走的時候。
>
> 要走快走，或滾回哪哪哪，彷彿你們大有地方可去大有地方可住，只是死皮賴臉不去似的。

[11] 關於這兩種時間感在原作品中如何交互呈現，更細緻的分析可見廖朝陽（2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有那樣一個地方嗎？」（Ibid: 169-170）

「男女見漁人大驚，雖未問所從來，你檢點自己已丟了殖民地圖，臉上也無刺青紅字，他們何能認出你是異國之人？好幾年前，你帶著尚幼小的女兒去尚未拆遷的大安公園址，想告訴女兒你幼時生長的就是類此環境。才進村子，立即一雙雙像你父親同樣年紀的眼睛驚怒向你，問所從來，你自覺與村中同樣攜帶小孩的尋常少婦無異，不知他們為何照眼認出你是外人？你只好老實回答。原來村中刻正如火如荼進行抗爭拆遷活動，以為你是記者或類此獵奇者，待明白了，便紛紛向你抒發訴苦，只是走前再再叮囑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Ibid: 232）

多年來評論家們樂於揣測朱天心及其作品的外省身分與家國想像，[12] 而朱天心則以持續創作和愈加「陷刻少恩」的現實批判代替聲嘶力竭的自我辯護。此處我們把焦點集中於上面幾段引文中對都市政治文化的描繪：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本土意識的持續上升，乃配合「內奸外敵」的他者塑造進行－外有中國大陸的國際打壓，內有外省移民的鄉愁繚繞－經由此二類差異範疇的塑造，凝聚疆域內人民對於抽象國族的符號認同，「愛台灣的本省人」和「隨時可賣台的外省人」形象經過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兩次大選遂成爲島內政治最具動員價值的符碼。而朱天心背負著外省第二代的標籤，[13] 欲質疑的是何以生於斯長於斯的經驗與眷戀竟敵不過身分證上的省籍欄，政治力先是粗暴地將其劃入他者的範域中急欲排毒清洗，又被投射以各種不利於本土政治社群的忠誠質疑，莫怪百口莫辯的作家會生產

[12] 如詹愷苓（楊照）(1991)；胡衍南（1993）；邱貴芬（1993）；楊照（1994）；何春蕤（1994）；黃錦樹（1995）。

[13] 感謝審查人的提醒，本文以「省籍」面向剖析朱天心作品與龍應台政策的心理意涵，然並不否認由其他角度論述的可能，例如兩人同屬於中產階級的背景；在此前提下本文試圖討論官方政策中蘊含應合於特定族群的歷史想像，是否能被不同身分的市民所接受，因之此處的分析主軸著重於其省籍面向。關於本文對於「省籍」概念的具體說明及相關疑旨可參見本文第五部分的說明。

國家圖書館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出《古都》這等疲憊的抗議。[14] 在此脈絡下，龍應台所主導的文化政策不啻是對外省族群的安撫與療癒（holding）：長年的族群對立在一九九四年選舉期間臻於高潮，陳水扁當選後又藉擦拭、消音特定歷史記憶樹立本土論述正統性以打造去殖民去威權的首都新故鄉，這些否定的舉措一一鯨吞蠶食了外省族群的家產；但失憶的城市爲抵擋趨死焦慮不斷尋找攻擊、投射、清洗的對象，在都市內部建構出種種敵對範疇，外省人乃被投以各種訕笑、質疑及污名。同爲外省籍的龍應台原即與朱天心有著較接近的鄉愁指向，乃巧妙地以「文化建市」之名撿回被阿扁輾碎的記憶，透過重建歷史論述、雜揉神州鄉愁和庶民情調的眾聲喧嘩暗度陳倉布爾喬亞文化之復辟，召喚虛擬的市民主體參與官方打造的文化消費，但真正的庶民－《香蕉天堂》中的門閂、聽不懂《梁祝》黃梅調的阿公阿媽、買不起戲票進紅樓的低收入家庭……－仍是缺席了。

不過這一連串關於外省人家產失而復得的推論都必須克服一個問題：本省籍或是台獨基進派的市民如何看待龍局長所形塑的「文化」？他們難道不需要被安撫療癒（holding）？在針對此問題回溯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本省作家在「台北文學書寫」中的缺席。我們記得白先勇筆下的金大班、記得《孽子》中的新公園如何交集了同志們的愛恨淒涼、記得朱天心作品中盪游的眷村老兵、記得袁瓊瓊《今生緣》裡休戚與共的眷村患難錄、甚或在逸耀東如數家珍的台北美食經裡覺到津津有味；相對於外省作家，尋常分類下的台灣文學似乎甚少對台北地貌進行這般栩栩如生鉅細靡遺的紀錄－不論是戰後左翼文學作品的孤兒意識，或六〇年代後的鄉土文學運動，「台北」要不從未出現，要不就繁華遙遠如異鄉。[15] 這似乎再次印證

[14] 朱天心（2001）本人亦曾自陳〈古都〉的寫作動機：她指出 1994 市長選舉期間對外省人彷彿處在一個「必須噤聲的狀態」，而對政治現狀和未來主張的合法解釋權，又清一色地被所有「親日、知日」的人壟斷，「不管年紀、世代，不管是不是政治人物」，因此她不僅要在作品中表達出她所關懷的某些族群的失落悵惘，更策略性地選擇了本土派的「法器」－日本作為小說的書寫對象。

[15] 要對所有現代台灣文學作品進行考察以追究其中的台北意象和作者的身分是幾乎不可能的，在此我們只根據一普遍的印象對於尋常理解下的「台灣文學」分析。當然我們無法否定可能仍有本省作家生產出出色的城市文學－尤其愈年輕的世代愈是如此，但在族群隔離意識最濃郁的戰後嬰兒潮世代作家作品中，這樣的分野確實存在的。在以寫作風

國家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了上一章末尾的推論－雖然城市中仍居住著眾多的本省人，但一來大多數本省人懷舊的對象仍指向外縣市的原生故鄉，[16] 再者交織著威權、殖民和壓迫的斑駁歷史更阻礙了本省人－不論老台北或新移民皆然－向來對在地政府的認同，因此外省人和本省人對城市景況實擁有迥異的認知基礎，台北的歷史澱積並不在本省移民所認知的家產（having）之列，其需要的撫慰來自翻轉殖民結構、重新「被代表」（re-presentation）的自主性，來自當家作主的揚眉吐氣；因此當外省籍的馬英九當上市長、當文化政策處處充斥著本省人不熟悉的語彙時，他們仍得以附著在種種抽象層次更高的集體認同符號上－從台灣人總統到新台灣人市長，透過這些強調草根性和土地認同的指涉，本省民眾感覺到統一不再是國家前途的唯一選項，藍/綠、外省/本土在多年扭曲的威權結構後終於有了平起平坐的機會，所以本省外省人在認同重塑的民主化過程中欲求的治療話語是迥然不同的－本省人在長期政治噤聲的壓迫下需要的是政權意識的翻轉，爭取著說台語、以「台灣人」自命的合法性，文化認同上的切割或排序反而不是那麼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17] 而外省移民長年來賴以在此地生存的價值信念在民主化後遭到踐踏，乃轉而棲身在（比較不具撕裂性的）文化認同之符號系統中保留歷史詮釋的彈性。

肆、消費社會中的市民主義

前面的討論多集中於官方如何藉由各項政策形塑市民的集體認同，然而認同是具有多重層次和內容的，爲了不把個體認同鎖死在族群身分與統

格而非作者背景為分類依歸的文壇，我們的問題設定似顯得古怪，但我們想問的不是一個“Why?”的問題，而是“Why not?”，我們認為中生代本土作家寧寫鄉村、山脈、海洋、小人物悲歌、反對運動等題材，卻在台北意象的創造行列中缺席，實蘊含一股無法言說的錯綜愛憎。

16 即使在今天，我們在台北初識朋友時常問的一句話還是：「你的老家在哪裡？」而每年團圓佳節時台北的空城景象也表徵了移民們對台北居的「暫留」心態。

17 是以本土派學者中對於「大中國文化」vs.「台灣文化」的表述仍眾說紛紜，而第一夫人仍興高采烈地為故宮文物的歐洲展覽出訪，大倡「文化外交」；年復一年的民調中更慣常要區分「文化上認同中國」和「政治上認同統一」。

國立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獨意向的封閉脈絡中，也爲了檢驗市民們如何應對官方的認同形構策略、如何在文化與發展的煙幕彈中維持能動，我們乃踏上城市的文化地景，選擇了兩個具有豐富意象的空間：誠品書店與西門町，[18] 討論市民主義與消費文化間的碰撞。

誠品書店自一九八九年開幕至今，已從一間實體書店之名上升爲一個品牌、一個文化現象的代名詞。誠品販賣的不只是具體的書籍，它妥貼運用著各種空間修辭販賣一種耽溺的美感經驗（南方朔，1998）；透過連鎖而不複製的分店分眾策略（蔣文德，1999：57），它比官方先行一步區隔了台北的文化／消費地景，捕捉甚或定義了各區域的消費者特性；對少數的知識菁英而言，誠品是台北文化水準的指標，並由此締造一種晉升全球社會的想像：「誠品使我感覺和法國生活的文化落差沒有那麼大」，[19] 連大陸文化訪問團參觀台北時，誠品都與故宮並列爲參訪對象（中國時報，1998）。誠品結合音樂、燈光、演說和書籍發展出一種「理念的消費形式」（蔣文德，1999：77），使消費者在虛幻的幸福感中「買」一種進步價值與菁英想像。

如果說誠品爲上班族提供了知識與品味的形象消費、不分族群背景統獨意識一律收編在書店行銷策略的網羅下，西門町則爲追逐時尚的青／少年提供了一個與世界流行接軌的消費空間。低廉的消費、五光十色的日韓流行精品、跨國咖啡館和健身中心的設置、每逢假日歡騰的娛樂宣傳活動，豐富了西門町的消費活力和錯綜差異，而各種青少年次文化的聚集更對官方的規訓權威形成挑戰，[20] 自成一另類的常態化／個人化（normalization/individualization）中心。

任何都市計劃必然存在權力斧鑿的痕跡。檢視此二消費空間的形成，官方與消費者實乃處在相互利用的關係中－西門町原是日據時代內地人的

[18] 台北的消費空間何其多，為何獨挑中此二場所？一個實際的理由出於研究成果的相對豐富，此二空間在近年來台北文化地景上的特出性吸引了無數文化研究者的評論和翻新，這自然導致解釋的豐富，而我們也希望藉由此二空間的對比呈現出兩種階級、團體文化實踐風格的異質性，故在許多空間展演中選擇了此二者。

[19] 建築師郭英聲語，轉引自蔣文德（1999: 93）。

[20] 西門町創意十足的青少年次文化充滿了對成人世界的顛覆，青少年在此建立自成一格的人際網絡和訊息交換管道，而諷刺的是官方卻也因此最愛在此舉行宣導活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歡樂街」、空間運用處處反映了殖民者的鄉愁，八〇年代後卻在都市現代化的再結構歷程中走向衰敗，都市中心東移後盤據黑道與色情業污名；九〇年代西門町商業活力能夠再生，既得力於官方系統性的淨空整頓、拆除老人活動的中華商場與茶館，而青少年也在同一個力場中創意十足地挪用威權對空間的支配、抹寫空間的神聖性。[21] 至於誠品雖然是個民營空間，其正面形象也爲精明的執政者挪用爲文化資本，不僅大陸文化參觀團來訪時將之與故宮並列爲台北文化地標，一九九五年誠品敦南總店搬遷的過程中，市政府更大方介入協助－「他（陳水扁）上任市長來，唯一的『關說』案就是代誠品書店向新光集團說項，請他們把原先計劃作新光三越百貨的場地割愛出租給誠品。他（陳水扁）說，台北如果多出一個百貨公司，大家的生活品質不會有太大改變，但是，如果『誠品』存在，會對台北人文新形象有幫助。」（轉引自蔣文德，1999：92）

回到本文初始的疑旨：在民選市府和台北市民心中，「台北市」此一符號下的主體究竟是何面目？對官方而言，打造「市民主義」的首要利基在湮滅國家認同的分歧，是以官方積極創造集體消費環境，一面期待各階級在歡愉中忽略差異、進入共同體的想像，一面將這些空間意象納入施政成就的標榜。然而市府此策略是否成功召喚出了「市民」主體？此外，誠品與西門町還鑲嵌在一個更龐大的立體結構上，那就是全球市場的消費網絡－在國際資本主義的階層板塊中，充溢布爾喬亞品味的誠品書店和青少年流行商品集散的西門町，正是全球時尚文化在台北、台灣的幅散據點，當個人透過消費行爲塑造個體品味與風格進而證成主體性時，此一認同的向量並未投注於消費所在地的台北或城市中的集體意識，而是以個體的姿態指向更上層的原鄉[22]－任憑它是巴黎／紐約／東京／倫敦，時尚在哪兒，

[21] 當龍局長（2003）自豪於她將中山堂廣場從威權歷史中解放、「還」給庶民自由運用時，然而青少年滑板族早已藉著在廣場紀念碑上塗鴉、練習滑板鬆解了空間的威權象徵。詳見遲恆昌（2001）。

[22] 誠品文宣中經常可見「文字零國界、資訊零時差」等字眼，或是以店中陳列的異國精品與世界文學塑造與世界接合的想像，（1995 年誠品的搬遷文宣：「卡謬搬家了。馬奎斯搬家了。卡爾維諾搬家了。……英國 Wedgewood 瓷器搬家了。法國 HEDLARD 皮件搬家了。1995 年 10 月 1 日誠品敦南店搬家，請您跟我們一道送舊迎新，移館別戀。」）在在顯示消費的樂趣不只建立在孤立城市的脈絡上，還蘊含著對更廣大世界的嚮往。

國家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生活就在哪兒－對後現代游牧民而言，消費文化之無能召喚出公共性認同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充其量爲個人所屬的次團體提供共享的價值或形象；然而主體未定的台北實亦需以這些資本主義的產物填充城市的自我形象，「倫敦／紐約／東京有□□，我們也有。」「我走在中華路林蔭大道，午後的陽光和人行道上的咖啡香，夏日午后的片刻偷閒，瞬間我彷彿置身巴黎香榭麗舍。……」類似的文宣在近年來的官方建設或民間活動文宣中不勝枚舉，[23] 我們太常以曼哈頓、蒙馬特、蘇活區自比，太少記起台北也有大稻埕、社子島、各種難以歸類的街坊圖像。如果說自我認同總是建立在比較和習得的差異上，則找不到代表性的台北在發展意識型態指引下只得藉模仿第一世界來自我完滿。此主體真空之狀態並非偶然形成，相較於世界其他大都會，台北在全球生產結構中的位置使它從早年國內經濟發展火車頭的「移入型」都市逐漸轉爲「移出型」都市（夏鑄九，1993），原有機會成爲「大熔爐」的文化生態乃蒸發爲渙散的高氣壓，疆域的流動加上主體代表的缺乏，遂藉著不斷的「混血」、「擬仿」、「換喻」來填充自我主體內涵。

但若以爲明確本質的缺乏是值得悲觀的，則或許又顯得迂闊。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1997）認爲，資本主義系統最驚人的自衍性乃來自於符碼不斷增生（cloning）、混搭（hybridizing）的動能，而流行時尚的運作邏輯更是把歷史深度與文化意義極盡抽離、但存隨時可汰換回收的符碼（朱元鴻，1996）。如果我們同意國族認同和商品認同兩者的心理乃交互補充縫合、其語彙可彼此改寫挪用（張小虹，2002），則經過了資本主義虛飾的「中國風」、「日本流行」、「英式復古風」等商品於是不再具有（泛）政治化的殺傷力，支持台獨的中產階級可以出於穿戴時髦、迎合美感、新鮮感、討好戀人等等理由買一件旗袍或長褂，憎惡日本軍國主義的大學生也可能和哈日族小朋友一塊兒爲 Kitty 貓大排長龍，政治場域中非黑即白的排他性選項，卻在消費者的符號系統中瓦解了，代之爲自我治理與隨時可後悔重來的歡愉（張小虹，2002；Bauman, 1992: 75f）。從個體微觀層次解

[23] 台北 101「世界第一高」的期待，和整個信義區以「台北曼哈頓」自我標榜的方式，再次顯露了這樣一種自我想像的貧乏和一切朝第一世界看齊的晉升欲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釋，當現實政治總離不開族群認同的僵硬設問時，在消費場域中相遇的市民似乎尋得了從妒恨與對立中逃逸的姿態，一種交換意義（風格、品味、詮釋與反詮釋等）的可能；然當去脈絡化的消費符碼氾濫成災、甚至形成新新人類的認識架構時，對公共性（publicity）的侵蝕斫傷亦值得更謹慎細緻的討論（Barber & Schulz 1996: 13f）。

伍、超越族群傷痕與資本主義邏輯的「台北想像」是否可能？

「省籍」在台灣民主深化的討論中扮演著多重角色：作爲族群分類的基準，省籍差異爲各種認同論述提供了初步的分析基礎，標誌著不同背景者對政權認可的可能起點；然則以本省／外省二分解釋認同意向明顯地過於粗糙武斷，故省籍情結也可能是個神話，惟認同現象的特殊性在於不論分類是否確切，範疇一但被命名便可導致某些主體的自我代入、進而區分我群／他群（us/them），省籍因而在各方欲語還休的操弄及爭辯下幻化成具動員能量的符號；更因此一標籤隱含的緊張，促使政客或學界試圖以中性語言緩和或掩蓋省籍間的差別，久之省籍差異的內涵遂被刻板化，對其心理結構和影響的分析乃相當貧乏。本文起於政治心理學的假設，並結合部分文化研究的成果，分析「台北市」作爲一政治主體的政治與文化意向／象；我們試圖說明「省籍」之分析意義並非推斷統／獨傾向或支配／劣勢，而是依附在省籍身世下不同的家國想像、歷史解讀、記憶傳承和其所召喚出的情感與政治判斷；故省籍不是關乎政治認同的單一解釋項，但置放在台灣戰後族群隔閡的歷史脈絡中，省籍身分乃爲思考認同內涵時可能的分離點，我們乃循此探索不同省籍主政者的族國想像如何呈現於都市政策或文化論述中，而不同身分之市民又具有怎樣的認同需要、及此需要能否被撫慰療癒。我們認爲，欲改變社會首先需同情地描繪真實社會的具體成像進而尋求療癒，而非將認同困擾丟入「無知之幕」中一味以規範性語言籲求無私無我的「公共性認同」（Kratochwil, 1996: 187f）。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並非誕生於真空中，而是承載不同情感需求的人們邂逅互動的場域（Ibid: 194）；在國族與文化的認同爭議早已籠罩關於台灣政治社會討論

臺灣主體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此刻，我們期望拋磚引玉，反思一種能夠容納情感與認同的公共性（publicity）和公民性格（citizenship）想像。[24]

長年爲威權統治政治中心的台北市，在一九九四年首屆市長選舉的情境中湧現了建構主體的需要，但城市內交錯的族群與階級生態和民主化初期敏感的傷痕使得這一自我形構的工程異常複雜。「市民主義」口號被視爲陳水扁當選的關鍵之一，然亦使其在履踐過程中進行了殘忍的劃界、肅清；至於馬英九任內，「文化」取代「公共政策牛肉」成爲其打造「台北」意象的主導性意識型態，透過龍應台的巧手打造，成就了兼容本土與國際、傳統與現代的城市文化象徵。

兩位市長以「階級」爲主軸而絕口不提族群衝突的態度，實乃苦於民主化過程中一再被挑起的族群傷痕，而期望凝聚一超越家國想像的城市生活認同。但長年來政治上的差別待遇和官方論述的刻板化畢竟使本省、外省族群架構了迥異的生活方式、生存空間、歷史意識、家國想像、感知結構，使其對外在世界的訊息與物事建立了迥異的存儲方式和價值判準，[25] 當外省籍人士的土地認同依附在對黨國政權的認可和落地生根的家園情感上，從而特別珍惜初來乍到時存在於台北的景物與歷史沿革的記憶，而本省人對國民黨政權的反感造成其對城市中的政治象徵與威權歷史冷漠疏離，其鄉愁常與台北不相干，而台北之於認定中的家園，更是個客體般的異鄉。不同鄉愁想像於是潛意識地引導著政治人物建設城市的方向：一九九四年市長選舉對民眾和候選人而言都是一場詮釋權的爭奪戰，而出線的陳水扁選擇將台北描繪爲「新故鄉」願景，反映其認知中台北除了威權象徵的負債外空無一物、城市未來務必走向繁榮進步，從而一面攏絡中產階級市民一面驅趕底層的公娼、榮民、低收入戶以爲犧牲獻祭，明確區分了「市民主義」欲召喚的市民階級 VS. 非正式部門中的「都市之瘤」。

然而社會需要歷史記憶、需要共享的價值目標，藉之超越死亡的恐懼，

---

[24] Michael Sandel 嘗批評 Rawls 在“A Theory of Justice”中的人觀是不切實際的“unencumbered self”；奠基於原級認同上的社群主義也許不是針對台灣現狀的可欲處方，但眾多自由主義者對於市民社會乃至公共性認同的尊崇卻也十分貼近 Rawls 的抽象化人觀而忽略了情感在（認同）政治中的根本影響力。

[25] 亦有學者有類似的看法，詳見陳光興（2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歷來國民黨統治下集體認同之匱乏已不待多言，市長選舉激化的族群對立又爲社會帶來更紛亂的主體失邊界之焦慮（psychosis），加上政經變遷過程中大規模的失憶症、健忘症，歷史觀點的錯亂，俱把社會往死亡本能推近，急欲投射內奸外敵攻擊之。隨著本土意識抬頭，外省人遂被建構爲社會中的他者，時時受到國家忠誠度質疑甚至具體的攻擊。外省作家朱天心的作品：〈古都〉則對這些現象提出控訴，既在都市環境中投射了其認同依附又抒發了外省族群遭效忠質疑的孤寂，最終要批判者仍是線性進步觀的粗糙、期在城市的今昔疊映中搭建另一種對未來發聲的基礎。而龍應台在文化局長任內喊出「文化建市」因而成爲體恤的治療：其以感性訴求兼容傳統與前瞻的文化政策實則皆針對其潛意識所認定的家產而塑造，片斷地拾回外省族群所熟悉的歷史刻痕，假文化之名光復陳水扁毀棄的家產，更以精緻的包裝塑造小資品味想像，文化政策於是既安撫了失憶的外省人，又拉攏了其欲召喚的中產階級市民。

然而，城市與市民畢竟是置身在資本主義的天羅地網中，官方出於兩重需要創造集體消費環境進而挪用其成果－其意圖以超越族群和政治意義的語言包裹市民集體意識的形構；又源於主體內涵的空洞和過往依賴發展歷史模仿第一世界都市的進步人文形象。我們選擇了誠品書店和西門町的空間形成與意義展演爲例，檢視市府協助該空間成形並引以爲傲的表現，認爲儘管官方期期將誠品藝文品質或西門町「青少年天堂」的正面形象納入都市的空間意象爭取公共性認同，消費者卻只是在購買行爲中實踐某種對於自我形象的期待（而這種自我形象何嘗不是受符號生產機制所指派），城市空間僅僅是消費者想像接近時尚尖端的中介點，「市民主義」在個體化社會中並不能靠集體消費凝聚。但相較於僵固對立的政治論述，消費行爲和空間書寫卻爲市民提供了狂想、顛覆、溝通、和解的能量。我們以一種非排他性的語言和姿態在消費環境中與他人邂逅、交流，在其中理解差異並置、眾生／聲平等，實踐個體性同時又與集體和諧相容，「消費」蘊含了尖銳的族群符碼無法衍化的後現代認同能量－從現代性的政治空間到後現代式的消費空間，市民們的認同表現也從亦步亦趨的化成（becoming）悄聲轉變爲恣意款擺的扮演（performitivity）（Storey, 2002: 114），拒絕政治力武斷地劃群或收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儘管市民難以將文化消費的愉悅轉化爲對城市本身的認同，在政治語言仍具撕傷力的環境下，官方只能以此貌似和解寬容的文化，用以填充台北的主體形象。可預見的是文化政策之設計將愈趨以飽含誘惑的姿態包裝著分眾主題攏絡特定次團體，「找自己」的旅程成了官方和市民的對弈，使市民在官方的認同操作策略下保有顛覆的能動性，惟文化政策思維一旦爲商業邏輯所滲透、甚至輕率地與民間資本家結盟，如何避免傷害社會性的公平正義？〈古都〉的哀惋和陳水扁任內諸多底層人民的犧牲都爲我們示範了都市的精神不健全如何斲傷個人的私密認同乃至基本人權，則在官方成功推銷出一個公共性的認同符號之前，[26] 以消費享樂填充城市內涵無異飲鴆止渴，「市民主義」仍是未竟。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中國時報，1998，〈大陸文化訪問團參觀故宮〉，6/30，30 版。

王明珂，1994，〈過去的結構——關於族群本質與認同變遷的探討〉，《新史學》，5(3): 119-140。

台北市文化局，2003，〈台北市政府文化政策白皮書〉，台北市文化局網站：http://www.culture.gov.tw（4/15）。

白先勇，1971，《台北人》，台北：晨鐘。

石之瑜，1999，《政治心理學》，台北：五南。

石之瑜，2001，〈論台灣政治的移民性質〉，《21 世紀》，68: 66-75。

朱元鴻，1996，〈歐洲？社會？理論？——布希亞的消逝藝術〉，收於黃瑞祺編，《歐洲社會理論》，台北：中研院歐美所。

朱天心，1997，〈古都〉，《古都》，台北：麥田，頁 151-233。

朱天心，2001，〈「大和解？」回應之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6] 1994 年市長選舉期間「扁帽」的暢銷正是行銷政治符號並匯聚認同的楷模，我們是否也能為「台北市」找到一個相應的象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3: 117-125。

何春蕤，1994，〈方舟之外：論朱天心的近期寫作〉，中國時報，1/1，39 版。

邱貴芬，1993，〈想我（自我）放逐的兄弟（姊妹）們：閱讀第二代外省（女）作家朱天心〉，《中外文學》，22(3): 94-115。

南方朔，1998，〈當文案變成一種文學〉，《誠品副作用》序言，台北：新新聞文化，頁 2-7。

胡衍南，1993，〈捨棄原鄉鄉愁的兩個模式：談朱天心、張大春的小說創作〉，《台灣文學觀察雜誌》，7: 117-135。

夏鑄九，1993，〈全球經濟中的台灣城市與社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 57-102。

張小虹，2002，〈台灣焦慮與時髦商品熱〉，《在百貨公司遇到狼》，台北：聯合文學，頁 57-76。

陳光興，2001，〈爲什麼大和解不／可能？——「多桑」與「香蕉天堂」殖民／冷戰效應下省籍問題的情緒結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3: 41-110。

黃錦樹，1995，〈從大觀園到咖啡館——閱讀／書寫朱天心〉，龔鵬程編《台灣的社會與文學》，台北：東大，頁 325-357。

楊　照，1994，〈兩尾逡巡迴游的魚——我所知道的朱天心〉，中國時報，1/20-21，39 版。

楊文全，1999，《都市政策即選舉文宣／選舉文宣即都市政策：民主政治在媒體政治中之異化過程—— 1994 年市長選戰中陳水扁「台北市政白皮書」建構之政治過程》，台北：台大城鄉所碩士論文。

詹愷苓（楊照），1991，〈浪漫滅絕的轉折——評朱天心小說集《我記得》〉，自立早報，1/6-7，19 版、15 版。

廖世璋、錢學陶，2002，〈古蹟保存的文化認同之探討——以台北市爲例〉，《都市計劃》，29(3): 471-489。

廖朝陽，2001，〈災難與希望：從「古都」與「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看政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3: 1-39。

蔣文德，1999，《閱讀誠品：全球化中誠品書店之空間文化形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台北：台大城鄉所碩士論文。

遲恆昌，2001，《從殖民城市到「哈日之城」：台北西門町的消費地景》，台北：台大城鄉所碩士論文。

龍應台，2003，〈誰的城市誰的家〉，中國時報，5/11，E7。

聯合報，2002，〈台北文學獎得主，十六位是異鄉人〉，12/16，17版。

二、英文部分

Barber, Benjamin R. and Andrea Schulz. 1996. *Jihad vs. McWorld: How Globalism and Tribalism Are Reshaping the World*.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Bauman, Zygmunt 著，楚東平譯，1992〔1988〕，《自由》，台北：桂冠。

Calvino, Italo 著，王志弘譯，1993〔1972〕，《看不見的城市》，台北：時報。

Kratochwil, Friedrich. 1996. “Citizenship: on the Border of Order.” In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ed. Yosef Lapid & Friedrich Kratochwil.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Storey, John 著，張君玫譯，2002〔1999〕，《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台北：巨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re We Living in Different Taipeis?
-- In Search of Taipei's Subjectivity: 1994-2002

Ya-han Chuang, Yi-ting Wang and Wei-li Wu*

Abstract

Departing from the analytical approach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combining some scope of cultural studies as well, this article is trying to explore how Taipei City perceives and performs its subjectivity politically and culturally. The first Taipei City Mayor election in 1994 aroused the city to construct its self-identity and rewrite inner boundaries; since then the two mayors—Chen Shui-Bian and Ma Ing-Jiuo-- have revealed their distinct imagination of what Taipei should be/have, which stem from their specific ethnic backgrounds and identity proposition, and therefore their policies are not as neutral as looked but dependent on their different recognitions of history. Meanwhile, various city inhabitants also yearn for idiosyncratic memories or attachment for identification that could be neglected or consoled through different policies. Whereas the consensual citizen identity is still questionable, individuals can nevertheless articulate alternative possibility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consumption but also brings about predicaments to Taipei embedded in the global capitalism structure.

Key words: political psychology, ethnic background, identification, subjectivity, cultural studies

*Ya-han chuang, Yi-ting Wang, Wei-li Wu ar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